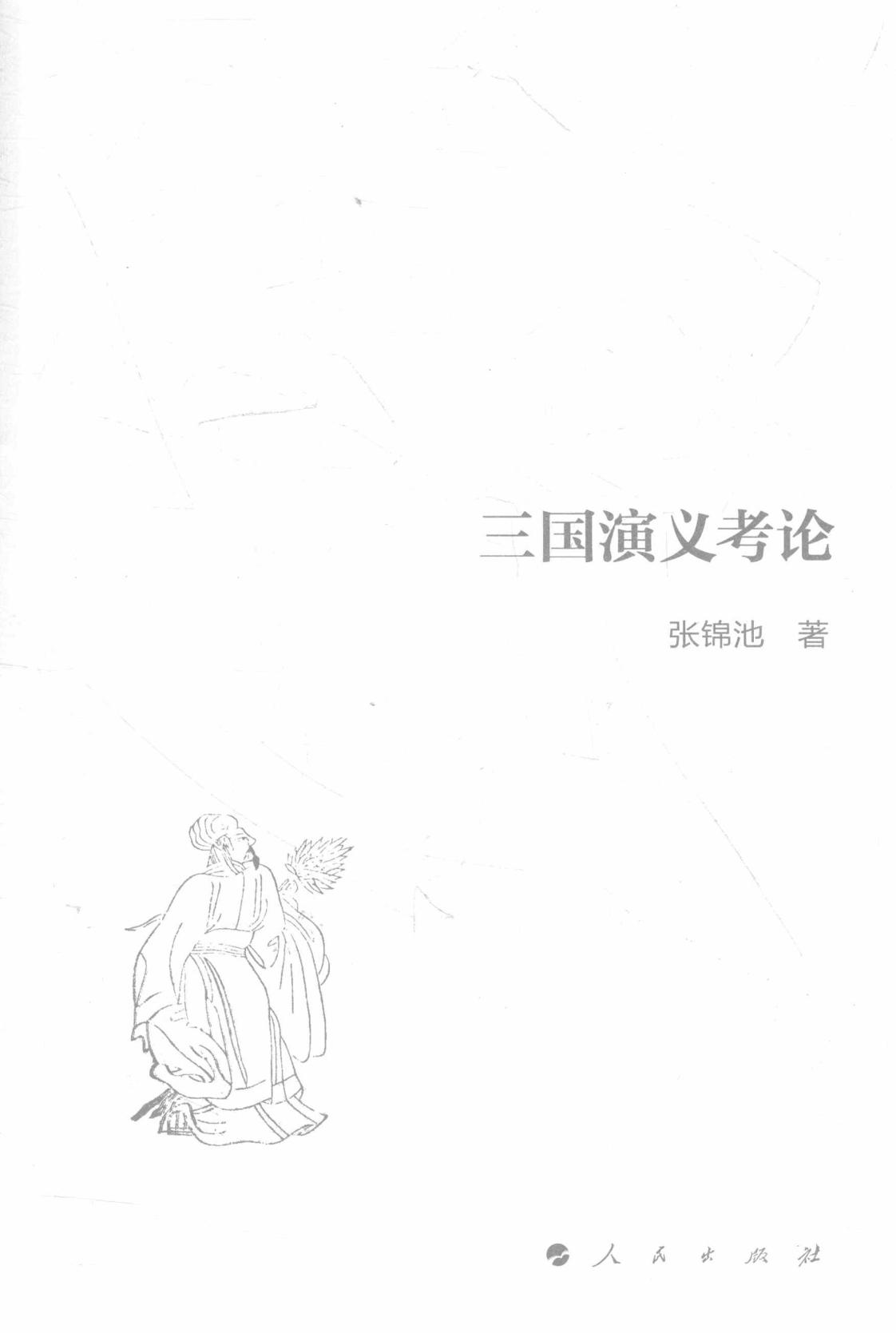


三国演义考论

张锦池 著

著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张锦池先生
最新力作
四大名著考论收官
上承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而有发展
灌注着鲜明的当代意识





三国演义考论

张锦池 著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考论 / 张锦池 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 - 7 - 01 - 015419 - 0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三国演义》研究 IV. ①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3355 号

三国演义考论

SANGUO YANYI KAOLUN

张锦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193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419 - 0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

序

刘世德

一

我与锦池兄同出身于北大。他比我低两届，但在燕园，我们没有会过面。

1980年，哈尔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这三者的交集，是我和锦池兄结识和结交的开始。

那年行前，为筹组学会，我去拜见吴组缃师，征求意见。谈话间，我问了一句，在红学界，时下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杰出

人士？吴师脱口而出：“张锦池，有头脑！学生里面我比较欣赏他。”

如今回忆起吴师此语，心中深深佩服他老人家的识人的犀利眼光。

其后，我和锦池兄同在红学界跌爬滚打，几年下来，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愧是一位正派的、鲠直的学者；他是我的诤友。

二

吴师常说，研究古代小说，要走两条路，一是研究小说史的源流和发展，不论是竖向的，还是横向的，二是研究名著，特别是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前者是博，后者是专。

锦池兄心中一直牢记着吴师的教诲。他不屑于区区“红学家”的称号，除了《红楼梦》以外，多年来，他还致力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研究。他已出版了《红楼十二论》、《红楼梦考论》、《西游记考论》、《水浒传考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等专著，现在又向读者呈献了这本《三国演义考论》，完成了吴师寄望于他的遗愿。

清人王芑孙曾在《读易楼记》中称赞一位学者说：“其好之之勤，而读之之遍，如此非专治一艺、专名一经者也。”显然，“专治一艺”与“专名一经”为昔之学者所轻。

锦池兄与某些“红学家”有异，恰恰与王芑孙的见解暗合。这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耀目成绩的原因之一。

三

在学界，锦池兄并不以“考据家”著称，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他其实是一位富有创见的“理论家”。

他努力地走在“理论”和“考据”相结合的道路上。

他的专著多冠以“考论”之名，这本书也不例外。有“考”又有“论”，这是他的追求；而且他把“考”字列于“论”字之前，可见他对“考”字的强调与重视。不难看出，他在论文和专著中表现出的许多真知灼见，都是精彩的、有说服力的。我认为，在他的笔下，“论”与“考”达到了和谐的组合。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锦池兄有一位学生，热情、浪漫，是个写诗的有前途的年轻人。锦池兄在此人大学毕业之时，推荐他到北京来报考我招收的研究生，并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他的意思是，此生乃可塑之才，“虚”已有，缺的是“实”，希望能在我的门下多学习些“实”的功夫。我不敢辜负老友的期望，努力地去做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锦池兄在治学上的追求。

四

著作多，不难。难的是，力戒浮词滥调的堆砌；难的是，要有创见，有深度！

从治学上说，在我的心目中，锦池兄的论著就是这样，多有创见，且有深度。

读锦池兄的文章，我的脑中时时回忆起吴师所说的那三个字：“有头脑”！

在这一点上，我自愧弗如。

以上肤浅的愚见，不知锦池兄以为然否？

至于这本书写得如何，读者诸君细阅之后，当信吾言非虚。

乙未初春，时年八十有三

前 言

《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论》(简称《三国演义考论》)是我多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一点成果。与《红楼十二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水浒传考论》等 11 部著作一样，也来自我的讲稿。书名题曰《三国演义考论》，是与《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水浒传考论》“排行”，合称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考论。

我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如此一部一部地进行，迹类皓首穷经。这是由于：我认为作为研究员搞科研本身就是目的；作为教师搞科研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以科研促教学，使学生真有所得一二，这是一个大问题。每念及此，胆子就越来越小，所

以便学刘姥姥“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遂适其要，而将文本、文献、文化做些整合一体的研究，学学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去研究些问题，以求心里踏实些。因而，当我开专题课时，便喜欢选那些学生读过的名著和别人谈烂了的重大问题，作为麻雀来解剖，从中让学生看看还能否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基点是求实，而把心思放在学贵有疑上。

多年来属于敝帚自珍的心得主要有如下一些。兹录于下，以便读者指正。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实际上是一部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于宣扬一种三本思想。那就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这种“三本”思想一以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褒贬诸镇的准则，不吐不快的方略。从而也就使作品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形象的“资治通鉴”。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乃人材之大都会。仅明主即有三位，战略家便不下四人。哪三个明主？一是刘备，二是孙权，三是曹操。他们都懂得人心为立国之本，而以刘备为最。他们都懂得人才为兴邦之本，亦各能用人，而“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他们都懂得战略为成败之本，果决善断，而以曹操“明略最优”。哪四大战略家？一是诸葛亮，二是鲁肃，三是曹操，四是司马懿。而如果说，诸葛亮大智若仙，曹操大智若谲，那么，鲁肃则大智若愚，司马懿则大智若

怯。既是战略家又是明主，一身而二任焉，唯曹操一人。可见作者对他的历史评价是公正的，不能说作品是曹操的“谤书”。所谓反曹，是反其急、暴、谲的本性，及其对汉室的态度。

认为诸葛亮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中心主人公，也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这浑然一体三个故事的中心主人公。

一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街亭之失，罪在马谡一人之不从诸葛亮的“节度”，而马谡之守街亭又是由诸葛亮任用的。小说中的诸葛亮之所以令人敬煞，亦令知耻者愧煞，就在于他之责己也，尤甚于责马谡。罗贯中的创造在于：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二者又是相为表里的。这就不仅肯定了诸葛亮的严于治国和严于治军，而且还集中歌颂了诸葛亮的大仁大德及其律己严而近乎苛的崇高品格。着眼点是“一夫有死，吾之罪也”，这是他斩马谡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所以自贬三等的根本原因。其一片丹心体现于此，其大仁大义亦体现于此！

诸葛亮在“失空斩”中表现出的“智、勇、仁”的圆融，正是君子之儒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格的光辉写照。正说明他是蜀国的儒法相济，以法济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而这也正是作者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儒法观念的寓意所在。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是俯仰史册，激扬理性。题材洗练，是缘史通志，谱写史诗。人物塑造，是博彩雅俗，因材成型。布局谋篇，是网状形态，传记组合。乃是一部具

有中国特色的古典主义开山作。

认为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否则就不可能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拥刘反曹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这个历史现象是：钦定的正史虽有帝魏帝蜀之争，莫不赞叹刘备的“德”。西晋以来的民众几乎清一色，都是拥刘反曹派，而且此风越演越烈。与此情绪比较合拍的，是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这种合拍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没有这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社会思潮，就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打倒罗贯中”，并不能解决文学史上的拥刘反曹问题。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古典小说，一写蜀汉之兴非兴于天之所佑，乃兴于刘备君臣之自佑，倘以“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说蜀汉君臣，那是最贴切不过的。当为英雄们唱一曲“宗汉情结”的颂歌，以示缅怀。一写宋室之亡非亡于天意，乃亡于其君臣自为，那宋徽宗既不能继书中“引首”所言宋太祖之武略，又不能承书中“引首”所言宋仁宗之文治，遂致蔡京之流祸国有路，梁山好汉报国无门。当为英雄们唱一曲“宗宋情结”的悲歌，以寄孤愤。二者相映成辉，遂使这两部忠义小说成为各具特色而相得益彰的姐妹篇。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其共同之点主要有三：其一，两部小说的文化意蕴似相异而实相类，写乱世忠义之甫离草泽即奋志匡扶社稷，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蜀汉英雄；写乱世忠义之被逼啸聚山林而尤谋“顺天护国”，是为《水浒传》

中的英雄好汉。二者虽题材不同，在蒙受江湖文化的影响上亦有轻重之分，而创作宗旨则一，即“义主忠义，而旨归劝惩”。其二，两部小说的忠义观念似相左而实相成。虽都“意主忠义”，而侧重点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侧重点是在“义”，在“下安黎庶”，即“为民”，作者是以“忠”济“义”写之；《水浒传》的侧重点是在“忠”，在“上报国家”，即“为国”，作者是以“义”济“忠”写之。论民本主义思想，《三国志通俗演义》实更充沛些；论爱国主义激情，《水浒传》实更浓烈些。其三，两部小说的结构模式似相异而实相同。二者皆以“忠”与“不忠”、“义”与“不义”、“仁”与“不仁”的忠奸对立的二维模式为其结构的基本模式。其结论当是：两大名著相映成辉，成为歌颂忠义的英雄谱。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正统观念既有以曹魏集团为代表的嫡系的、典型的、传统的；又有以蜀汉集团为代表的非嫡系的、非典型的、非传统的。其区分在政权的思想性质上：蜀汉政权是植根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市井小生产者的思想的沉淀；而曹魏政权则是植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深层。

典型的、传统的正统观念，强调“君君臣臣”，所规定的君臣关系是严格的主从关系。虽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凡事必须面君，然后才能施行。曹操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驭士之术堪称海内无匹。他昭士之功，誉士之德，无贵无贱，唯才是宜，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放眼群英，厚待异己。另

一方面谁若违反他的意愿，窥视他的势欲野心，或言其不仁，就会人头落地。虽契友荀彧和良才杨修也在所难免。正所谓“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安危系于他一人的喜怒。曹魏集团的这种宽猛相济的君臣关系，应该说是传统的正统的君臣关系。曹操对黎民百姓也是王霸相兼，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他知道民心之可用，高唱“天地间，人为贵”，呼吁“咸爱其民”，俨然千古贤相；另一方面，为报父仇，竟“坑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水为之不流”，其残忍如斯。

正是这种宽猛相济和王霸相兼，成为他统治人民的法宝，使他具备“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双重品性。这一特点也是千百年来地主阶级传统的正统派的统治特点。正是这种传统的统治术使他能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终于为子孙创下基业。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蜀汉政权的正统观念，虽然也是属于封建思想体系的范畴，但又不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嫡出。我们知道，典型的、传统的正统观念，其五伦的排列顺序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朋友关系居于五伦之末。而蜀汉政权的五伦关系却是“五伦备其三”，即“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三伦一体的君臣关系。刘备作为王室后人，把关羽和张飞看成“朋友而兄弟”，以示对他们人格尊严的尊重。而关羽和张飞作为庶人，则是把刘备看成是“君臣而兄弟而朋友”，以示对他社会地位的尊重。君臣之间，互信互赖，如鱼得水，而刘备则以鱼自居。关羽、张飞等良臣，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朴素的平等

倾向，正如“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所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实际上是对“君君臣臣”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传统的正统的君臣关系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突破。这种非传统的正统观念为蜀国君臣所信守，我们称之为“桃园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与“水泊理念”相通。

典型的传统的正统观念，不只是欺骗和慑服人民的工具，而且是排斥其他封建势力的竞争以稳定地主阶级利益的手段。因此，它特别强调“忠”。至于稍具平等色彩的“义”，却被置于五伦之末。而《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也主张“忠”，但是，是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的，否则，将“良禽择木”，赵子龙就曾三易其主。一旦忠、义发生矛盾，则以公理为圭臬，宜而行之。“义释华容”，就是最好的例子。作者这么强调“义”，几乎将其提居于五伦之首或相并列，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正统观念的一种反动或不恭。

认为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对仁政的态度是憧憬，对“三纲”等道德观念的态度是褒扬，因此都是讽喻文学；而《红楼梦》对仁政的态度是嘲讽，对“三纲”等道德观念的态度是讥刺，因此是叛逆文学。《西游记》则介于二者之间，是“跃弛滑稽之雄”。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一写志士仁人是如何地在刀光剑影下为国捐躯，一写绿林豪杰是如何地欲尽忠报国

而壮志难酬。二者皆是反对“霸道”的无视于人的“生存”和“温饱”。其欲解决者乃是如何从“三纲”中吸取圣贤们的良法美意，以在此“礼”之大体的框架中谱写王道乐章的问题。这也就是施、罗二氏褒扬“三纲”等道德观念，而对“君为臣纲”颇多瞩目的原因。其所提出的新思想，则有“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三伦一体”的主臣观念。

而《红楼梦》则不然，作者认为那“王道”只给人以生存和温饱，不给人以“发展”，推动历史前进，也在吃人。那封建思想和等级制度治理天下的结果却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它所提出的问题已不限于某某君主是否有道，而是对封建君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因此，曹雪芹对仁政的态度是嘲讽，对“三纲”等道德观念所含的圣贤们的良法美意是讥刺，因此是叛逆文学。

认为《西游记》则是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它打着个性解放的思想烙印，虽处于“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态，而在客观上却是对传统的“君为臣纲”等观念的一种文化冲击。

认为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无淫妇，多节妇，是由于它所描写的妇女多来自绣户侯门，作者是从士大夫的审美心理角度写出的，所以旨归封建正统文化的风范。《水浒传》中寡节妇，多淫妇，是由于它所描写的妇女皆属于市井中人，作者是从绿林豪杰的审美角度写出的，所以蕴含江湖文化的元素。二者蒙受的教育不同，文化素质不同。一个把班昭的《女

诫》当作座右铭恪守之，一个则视为废纸唾置之。《西游记》作者说得好，“情欲原因总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玄奘的“坐怀心悸”正是以此为审美特征的，是故“禅心虽在”，却已非未沾泥之絮，故可视之为宗教光环下人之爱欲觉醒。它打着个性解放的思想烙印，是对传统的“阴人不吉”观念的一种文化冲击。《红楼梦》呢？则公然主张婚姻应以爱情作基础，反对男尊女卑而以相互尊重为原则。认为“夫为妻纲”的观念是不合理的，认为男性居于社会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是不合理的。作者是以封建叛逆者的审美心理角度写出的。所以这种妇女观和婚姻观具有世法变革的性质，所以是进步的，乃“东方的微光”。